

在炮火中孕育的文化工程 / 《新华字典》

一本书的三场交锋 / 《牛虻》

穿越八载寒暑 / 《三国演义》连环画

传奇背后的故事 / 《林海雪原》

开风气之先的红色经典 / 《红旗谱》

经典是怎样炼成的 / 《十万个为什么》

伯乐的胆识和魄力 / 《李自成》

七十年涛声依旧 / 《辞海》

新时期文学第一葩 / 《重放的鲜花》

编辑要有站位意识 / 《谈美书简》

知识、艺术与情感的回归 / 《傅雷家书》

从一部残稿到一套热书 / 《上下五千年》

那年·那人·那书 / 《万历十五年》

中国第一部鉴赏辞典 / 《唐诗鉴赏辞典》

二月河怎样流进“长江” / 《雍正皇帝》

一座知识丰碑的“前世今生” / 《英汉大词典》

创新是出版的生命 / 《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不一般的“绅士行动” / 《斯佳丽》

“天书”是怎样“名利双收”的 / 《尤利西斯》

年华易逝书长存 / 《追忆似水年华》

从一部教材到一个产业链 / 《大学英语》

从畅销书到品牌书 / 《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

一本逼出来的书 / 《岁月随想》

郝铭鉴 孙欢 主编

倾听刻海

好书背后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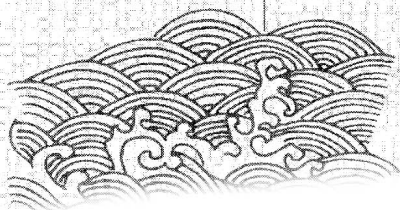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郝铭鉴 孙欢 主编

倾听 刻海

好书背后的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倾听书海：好书背后的故事 / 郝铭鉴 孙欢 主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2

ISBN 978-7-5452-0173-4

I. 倾… II. ①郝… ②孙… III. 图书-编辑工作-经验-中国IV. G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69760号

倾听书海：好书背后的故事

主编：郝铭鉴 孙 欢

责任编辑：蒋逸征

装帧设计：叶 珺

出版：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建国西路384弄11号甲

印制：上海崇明南海印刷厂

规格：787×1092 1/18 印张19

版次：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52-0173-4/G·019

定价：30.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021-33854185

序

每当踏进书店，或者徜徉书市时，总会油然想到一个比喻：书海。书海，这是思想的海，知识的海，感情的海。这里，波翻浪叠，浩瀚无涯，天水一色，气象万千，充满着力度和美感。“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该是何等惊心动魄的景象。本书便是从书海采撷来的一束浪花。

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说过一句话：书，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读者的精神需求、审美取向、阅读习惯，引导着作者的写作。而在读者中，理所当然包含着编辑。一本书从写作到出版，是一个文化生产的过程。编辑不仅是生产的组织者，而且是产品的鉴定者，是代表广大读者利益的特殊读者。每一本好书背后，都会有很多故事，本书讲述的是编辑的故事。

从在连天炮火中诞生的《新华字典》讲起，本书时间跨度为60年，但重点是《重放的鲜花》出版以来的30年。倾听书海，你一定能听到改革开放的脚步声。30年前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在图书出版领域，改革开放的春风，极大地解放了编辑的生产力，一扫“书荒”的贫困景象，迎来了“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无边春色；更令人欣喜的是，它打开了编辑的精神桎梏，让他们在社会文化生产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重放的鲜花》也许便是一个标志，没有改革开放，这些“鲜花”怎么能够重新绽放呢？

倾听书海，你一定能听到编辑智慧的浪涛声。图书，是人

类智慧的载体。一本书能否站得住，主要靠作者的智慧；一本书能否打得响，则主要靠编辑的智慧。解剖每一本好书，你都能发现编辑的投入，编辑的贡献。一个称职的编辑，要敏锐地捕捉市场需求，准确地把握阅读心理，同时还要巧妙地激发作者的写作欲望，坚定作者的写作信心，铺设作者和读者沟通的桥梁。编辑智慧可以有效地强化图书的市场效应，延长图书的生命周期。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出版《智囊》，它可以让一代又一代编辑从中汲取养料，更好地掌握编辑工作的规律，进入出版的自由境界。

倾听书海，你一定能听到文化追求的号角声。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说到底都是一种精神现象，在它们的背后，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追求。郁达夫有诗云“著书都为稻粱谋”，其实这和鲁迅的“无聊才读书”一样，是对恶劣的社会环境的抨击。否则，怎么称得上是左翼文艺战士呢？从前辈出版人的“开发民智”，到我们今天的传播先进文化，其中一脉相承的，是文化的使命感。这是编辑的出发点，也是出版的原动力。阅读本书中的故事，除了学到编辑眼光、编辑艺术、编辑技巧之外，更能感受到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编辑精神。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离开文化是不行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离开出版同样是不行的。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追求、不断进取，正是好书背后的故事的一个共同的主题。

现代舞的创始人邓肯说过一段话：“在所有能使人得到欢乐，能使灵魂得到满足的运动中，海浪的运动在我看来是最为壮观的。”在我们倾听书海之后，会得到同样的结论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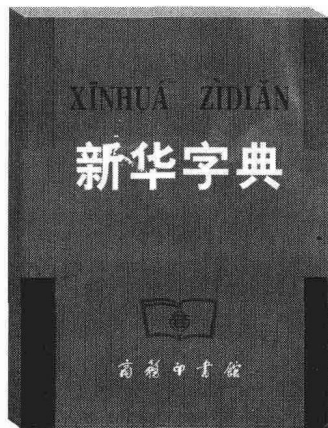
郝铭鉴

2009年1月

目 录

1	序
5	在炮火中孕育的文化工程/《新华字典》
14	一本书的三场交锋/《牛虻》
22	穿越八载寒暑/《三国演义》连环画
28	传奇背后的故事/《林海雪原》
35	开风气之先的红色经典/《红旗谱》
44	经典是怎样炼成的/《十万个为什么》
55	伯乐的胆识和魄力/《李自成》
61	七十年涛声依旧/《辞海》
69	新时期文学第一葩/《重放的鲜花》
76	编辑要有“站位”意识/《谈美书简》
84	知识、艺术与情感的回归/《傅雷家书》
88	从一部残稿到一套热书/《上下五千年》
98	那年·那人·那书/《万历十五年》
103	中国第一部鉴赏辞典/《唐诗鉴赏辞典》
110	二月河怎样流进“长江”/《雍正皇帝》
122	一座知识丰碑的“前世今生”/《英汉大词典》
131	创新是出版的生命/《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142	不一般的“绅士行动”/《斯佳丽》
152	从一部教材到一个产业链/《大学英语》
162	“天书”是怎样“名利双收”的/《尤利西斯》

172	年华易逝书长存/《追忆似水年华》
183	从畅销书到品牌书/《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
192	一本逼出来的书/《岁月随想》
202	延迟两年出版为了什么/《英国病人》
207	开启图文书的先河/《老照片》
218	从营销图书到营销作者/朱德庸漫画书系
227	一本让出版社成为“富爸爸”的书/《富爸爸,穷爸爸》
237	“出版神话”的出版之旅/《哈利·波特》
247	七年打磨“虫”书/《昆虫记》
252	图书营销策划七要素/《我为歌狂》
263	牛书·牛人·牛眼光/《藏地牛皮书》
268	撬动童书市场的力量/《淘气包马小跳》
276	菊花香散余韵犹存/《菊花香》
284	“水煮”的本土风味/《水煮三国》
291	营销是没有止境的/《达·芬奇密码》
297	这匹“狼”走向世界/《狼图腾》
303	小“故事”讲大历史/《话说中国》
316	破冰/《品三国》
326	给读者一个理由,爱上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
332	细节·全程营销·本土化细节/《YOU:身体使用手册》



在炮火中孕育的文化工程 《新华字典》

文/吴海涛

1953年12月，首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由魏建功题写。版权页上说首次印了10万册，但叶圣陶日记上写的是500万册，半年之内售罄。1957年起，《新华字典》转到商务印书馆出版。50多年来，它12次修订，重印近200次，发行量累计高达4亿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出版发行史上众多之最。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小型汉语字典，到2008年止，已经出到第十版，印行逾4亿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构思这样一部通俗普及的字典，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大专家编小字典，一群北京大学的语言文字学家初步确立了编撰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民众正需要一部贴近实际、方便学习的工具书，由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叶圣陶组织策划，北大教授魏建功担任主编，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新华字典》在共和国诞生前酝酿，在共和国成立初问世，始终与共和国共成长。

一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攻城战役一触即发。就

魏建功 1962 年在北大
副校长前摄于北大寓所



在这炮声隆隆、人心惶惶的时节，城内一户普通人家的客厅里，几个男人却在谈论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一件事，即如何编写一部真正适合于大众的字典。借助客厅昏暗的灯光，能够依稀辨出这几个人：周祖谟、吴晓铃、张克强、金克木、魏建功。他们是同事，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都是当时中国一流的语言文字学家。相比城外决定民族命运的炮声来说，几位学者在谈论如何编写一部小字典，无疑是件小事。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看，这的确又是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这件事的发起者，正是这间屋子的主人，那位名叫魏建功的学者。

魏建功，1901 年生人，师从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上皆造诣深厚，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也极具先锋意识。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国语运动”极为认同。所谓“国语运动”不外乎两个方向，即“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言文一致”指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指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基础。从不满 30 岁开始，魏建功就积极推广这项运动，并展示出惊人的专业才华和组织才

能。27岁时，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七名常委之一。1945年，他又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在那里大力推行国语运动达三年之久，使得台湾成为全国最早推行“普通话”的地区。1948年10月，他回到了即将决战的祖国大地，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新社会的来临。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

在魏建功眼中，始于20世纪初的“国语运动”成果是可喜的。至少，人们用白话文来书写、交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习惯。言文一致，已经成为读书人的主流意识。但在日益普及的白话环境下，却一直没能出现一部广泛适用的语文工具书。常见的字典在收词上往往存在着重文轻语、脱离白话环境的语言实际、释义辗转传抄、缺乏语文科学分析等弊病。以出版于1948年的《国音字典》为例，其中关于“刀”有三个义项：1. 供切割斩削之利器。2. 古钱币名，作刀形故称。3. 小船。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见《诗经》。这里的注释有两点弊端：首先，释义仍用文言表达，而非社会上逐渐流行的白话；其次，对于“刀”的后两种释义，完全属于古汉语，在实际的大众语言中几乎无人使用。

一般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更多刚刚脱离文盲状态的民众，迫切需要一部新颖、鲜活、简单实用的辞书作为日常学习的“无声老师”。在魏建功等人看来，这部书的出现，将直接影响一个民族对母语文字的认知，也将进一步影响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所以，当年魏家客厅的那个小型聚会，其意义与城墙外的炮声是同等重要的。当事人之一的金克木先生在多年之后，深情地回忆道：“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

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就在魏建功等人仔细讨论这部未来字典的体例和结构时，还有一个人也在筹划这件事情。他就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叶圣陶。叶圣陶关注语文工具书，首先是从一个老资格出版人的角度。他建议做小字典，并动手做字典样张数个，商定体例，后来因故放弃。以一个出版人的敏锐眼光，叶圣陶察觉到旧式的字典因为“不便于初学”而无法赢得市场。1952年7月，新字典还未面世，但社会需求却已经空前旺盛，“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推行，工厂与部队纷纷传习。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当人们从市面上挑出两种字典让叶圣陶审读鉴定的时候，他发现毛病颇多，“或不能予读者明显之概念，或语焉不详，虽不云错，亦未全对，或用语艰深，不易使读者领会。总之，初学者得之，固以为得所依傍，实则未能解决问题，或仅在解决与不解决之间。市上小字典当在百种以上，大家抄来抄去，猜想皆此类耳。出版家喜出小字典，视为商品，未能多为读者着想”。显然，作为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出版家，叶圣陶和魏建功等语言文字学者关注到了同样的问题，即面对母语文字的急速普及，缺乏实用



编辑出版家叶圣陶



北大教授魏建功（图右一）

的语文工具书已经成为一个必须突破的“瓶颈”。

二

中国大地上炮声甫息，硝烟渐逝。魏建功成为建国后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而叶圣陶也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

版社社长，开始与魏建功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此时的新政权，百废待兴，各种岗位上急需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人们纷纷要脱盲，要识字，要学习文化。旧式的字典自然“不便初学”，而且对于新建的社会主义政权，旧式字典中所附带的陈旧价值观念也不容再流行。这样，编写一部全新的普及型字典，成了一件势在必行的大事。

编写出版字典的策划人和组织者，当然非叶圣陶莫属，他有着出版家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而字典的主编重担，则众望所归地落到了魏建功身上。这一段故事，也是很有传奇味道的。当叶圣陶在1950年3月征询魏建功是否愿意编字典时，这位大学者喜不自禁，一口答应。只是他担忧自己担任的北大中文系系主任一职必然牵制精力，不知如何摆脱。叶圣陶也很干脆，很快修书一封，恳请当时的北大主事者撤销魏建功系主任一职，只保留其教职。于是，魏建功得以“无官之身”投到叶

圣陶帐下。这样，刚卸去堂堂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他，又被任命为一个小机构的领导，即新华辞书社社长。这个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机构，附属于当时的出版总署编审局，规模很小。在存在的两年多时间内（1950年～1952年，后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它大多数时间只进行一项业务，即编写以它命名的《新华字典》。当魏建功上任时，新华辞书社资料匮乏，全部资料只有他口袋里揣着的八页淡黄色竹纸。那纸上，楷书工整，誊写着他这两年来与金克木等友人一起商讨拟定的《编辑字典计画》。“计画”概括了这部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以音统形；以义排词；以语分字；以用决义；广收活语言；由音求字；由义选词；适合大众；精选附录。事实证明，这几张竹纸上的设想，几乎都在具体操作中一一实现。《新华字典》编纂体例的蓝本，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已经在学者们的脑海中酝酿成熟了。

参与新华辞书社首版《新华字典》编写工作的，最多时也不过十来人。但对于这样一部意义重大的字典，每一位参与者都极其投入。以资格最老的魏建功为例，年过半百的他一边坚持在北大授课，一边抽出时间赶到社里主持字典编纂。由于时间紧，他还常常将稿子带回家里审改。至于报酬，一分钱也不要，完全是义务性的。编纂过程是集体负责制，每一个字都单独写在一张小卡片上，编写人在卡片上撰写条目，盖上图章以示责任。然后大家相互传阅，把意见也写在卡片上，盖上图章。这样，卡片在传阅讨论后，汇总抄出的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按理说，有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凭借这样的敬业精神，编出一部高质量的字典指日可待，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新华辞书社”的工作于1950年8月正式展开，原计划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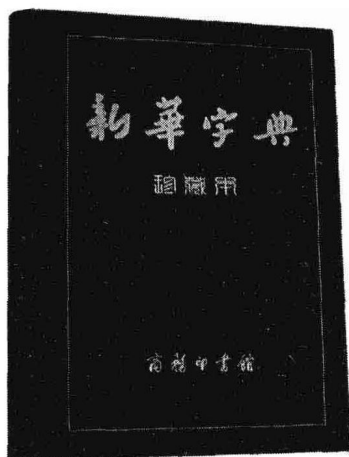
内将《新华字典》完稿出版，但实际上未能如愿。后推迟，要求1952年6月修订完工，年底出版，依然落空，再度延期。直到1953年12月，第一版《新华字典》才终于杀青付梓。

不断地延期，正是因为精益求精。原本在1951年夏天，字典初稿本已按时完成，当送达终审者叶圣陶手中时，这位专家型的领导肯定“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例，均用心思”，但还是感觉它的普及性明显不够，“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此外初稿还有思想性不够、科学性欠缺等问题，决定延期出版，进行修改。谁知道，这一改就又是两年多。征求专家、读者意见，修订；再征求意见，再修订。连叶圣陶自己也挥笔上阵，以他出版家、文学家、教科书编写专家的手眼，对字典的初稿和修订稿逐字逐句仔细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

编写这样一部大众性的普及辞书，对于学者来说并非易事，因为除了讲究科学、准确外，还须讲究系统、平衡和简明。要知道，辞书编撰本身就是一门专门的学问，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就连后来亲身参与修订的叶圣陶也深深体会个中滋味：“编撰之事确亦至难，每改一次，以为无病，而他日重看，又见疵纇，欲求精审，谈何容易。”到《新华字典》编纂后期，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看到字典的样本，依然认为问题不少。叶圣陶把这意见转告给了主编魏建功。我想这两位新式字典的强力

第一版《新华字典》诞生于1953年，新华辞书社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封面“新华字典”四个字由魏建功书写。开本为大64开，单字按照注音字母顺序排列，每个字不同音义列在一起，另有《笔形部首检字表》。后考虑到不同方言地区读音问题，又编写了部首排列本，增收600余字。每本售价1.5万元（折合人民币1.5元）。

新华字典珍藏本



倡导者，此时可能唯有相对苦笑。那几年，他俩除了繁重的业务和行政工作外，都为这部字典花费了巨大精力，但结果却依然未尽如人意。还是魏建功先生通达一些，他说：《新华字典》是一部完全创新的字典，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脱出了旧字典的窠臼，“不如其他字典之抄来抄去”，“好歹算是一个好东西”。要想做到精纯正确，只有等将来有机会再进一步修订了。叶圣陶也只好默认了这个结果。

三

今天看来，《新华字典》经过数十年的打磨，近百位学者的心血浇灌，已经堪称一部辞书精品。但这一切，都肇基于当初编者自己并不太满意的第一版。从第一版起，《新华字典》就划清了它与以往所有汉语文辞书的界限，成为第一部完全以白话释义、白话举例的字典。以上文所举的“刀”字为例，首版《新华字典》的注解是：1. 用来切、割、斩、削的工具：一把菜刀、刀刃、单刀、镰刀；2. 纸张的单位（数目不定）。明白如话，实用简练，与五年前（1948年）出版的《国音字典》，在文风、内容上已有天壤之别。

应该说，首版《新华字典》是汉语言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醒目坐标。在“国语运动”推行40多年之后，以普通话为民族共

同语，以白话文为书面表达文字，这些已经深入人心。而这些在《新华字典》里，第一次以字典的形式确认下来。字典无愧于它的名字——“新华”，通篇散发着新时代的气息。由于编撰者特别注重“广收活语言”和“适合大众”，这部字典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汉语言鲜活的状态，能够让广大民众携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实用亲切。而在国民基础教育未能普及、文盲半文盲数量巨大的过去数十年里，一部《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它为这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华字典》还在不断修订、重印和发行，它将永远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度的读书人，随着时代的发展常改常新。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魏建功、叶圣陶等一批伟大的奠基者，他们挟带“五四精神”的余风，怀着语文革新的崇高理想和为新中国文教事业服务的满腔热情，为国人们留下了这部小书，更留下一段动人而悠长的回忆。

《新华字典》的历年版本

1. 1953 年，注音符号音序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2. 1954 年，部首排列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3. 1957 年，注音符号音序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4. 1959 年，汉语拼音音序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5. 1962 年，汉语拼音音序修订本，丁树声主持。
6. 1965 年，汉语拼音音序重排本，未公开发行。
7. 1971 年，修订重排本，周恩来总理亲自参与。
8. 1979 年，修订版，北师大修订。
9. 199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0. 199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1. 1994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1998 年，语言所修订。
13. 2004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封面注为第 10 版。

一本书的三场交锋

《牛虻》



文/胡守文

“牛虻问题”点燃译者李佺民的激情

1991年6月3日，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中国十大翻译家之一，《牛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斯巴达克斯》等一系列经典文学作品的译者李佺民先生，不幸在上海病逝。

这是一代翻译巨匠与我们万千读者的永别。痛惜之情，难以言述。

李佺民翻译《牛虻》的冲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而真正动手翻译，则已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李佺民这种深埋在心底的创作激情和夙愿，从30年代开始，直到50年代初，一直没能熄灭。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才为他这种激情的喷发创造了条件。他先后在旧书摊和书店里买到两种《牛虻》俄译本和一种英文原版本。两种俄译本，一种由儿童出版社出版，一种是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他反复对照三种不同版本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牛虻》中译本，满足了新中国青年读者长期的渴望，出版之后轰动一时，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私人的书架上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推荐的评论，读者们举行了很多讨论会。单是《牛虻》的发行数量就足以雄辩地说明它在中国的读者群中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截至1955年8月为止，该书共印行了7次。初版的印数为200400册，7次累计印数为706735册。